

※書目文獻※

浙江圖書館的歷史文獻收藏及其特色

丁紅*、程小瀾**

浙江圖書館座落於我國著名歷史文化名城和重點旅遊城市杭州，是國家辦的大型綜合性省級公共圖書館。

從具有近代公共圖書館性質的藏書樓到現代化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已經歷了一百年的歷史。其前身杭州藏書樓創辦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光緒二十九年(1903)，杭州藏書樓擴充改建為浙江藏書樓；宣統元年(1909)，浙江官書局歸併浙江藏書樓並正式以浙江圖書館命名。辛亥革命後，文瀾閣歸併浙江圖書館，一九一二年孤山館舍建成，一九三二年大學路館舍正式開放（蔡元培先生題寫館名），一九五一年接收著名藏書家劉承幹先生捐贈的嘉業藏書樓，二〇〇〇年十一月館慶一百年時，曙光路黃龍洞新館正式開放。現有館舍四處，以曙光路新館為總館，另有孤山路與大學路館舍以及南潯嘉業藏書樓，總建築面積達四萬五千平方米，文獻藏量達四百五十萬冊（件），其面積、設施、服務均已躋身國內先進圖書館的行列。

悠久的歷史為浙江圖書館古文獻的收藏奠定了宏厚的底蘊和豐富的內容。浙江圖書館設有古籍部，專門從事數量約為一百二十萬冊一九四九年以前出版的古籍、金石拓本、名人手札、舊期刊、舊報紙、舊輿圖、舊平裝圖書以及一些特藏地方資料的收藏、流通、整理與研究。古籍部設在孤山館舍內，孤山館舍位於西湖孤山南麓，背山面湖，占地九千六百平方米，由三座民初樓房組成：白樓是我國最早建造的專用圖書館館舍之一，現為普通書庫和讀者閱覽處；紅樓乃光緒二十九年(1906)為迎德國皇太子來杭下榻而建，現為古籍修復室；還有一座楊虎大樓，又稱青白山居，係原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的私人別墅，現為珍本藏書庫。三座樓房皆因其

* 丁紅，浙江圖書館古籍部主任。

** 程小瀾，浙江圖書館館長。

獨特的建築風格與歷史意義而被列為浙江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浙江圖書館館藏歷史文獻的來源，主要通過採購、接受、交換、傳抄、複製等途徑實現。杭州藏書樓改建為浙江藏書樓的過程中，進行了首次大規模的圖書採購行動，當時派出舉人出身的馮巽占專程赴上海購置了大批圖書，為浙江藏書樓的建成奠定了基礎。除了採購，接收社會各界的捐贈，也構成了館藏歷史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浙江被譽為人文淵藪之省，藏書之家棋布林立，代不乏人，身處藏書之鄉的浙江圖書館，在古文獻收藏方面因此而享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浙江藏書樓時期即有省內十餘人捐贈圖書，如桐廬袁仲默捐贈《湛然居士文集》等十四種，仁和許青卿捐贈乾隆刻本《二十四史》共三千二百四十二卷。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四年五年間受贈圖書一千六百四十九種，一九三一年章厥生捐書二萬餘冊，一九三四年莊澤宣捐贈先祖遺書二十七箱，一九三五年收到各界捐贈圖書七千三百餘冊，其中杭州孫君木捐贈其父壽松堂遺藏六百餘種二千多冊。五十年代初期，浙江圖書館接受省內多批藏書故家的捐贈，較為重要的有龍游余氏寒柯堂、慈溪秦氏抹雲樓、李氏萱陰樓、蔣氏衍芬草堂、連氏枕湖樓、奉化孫氏天孫閣、黃氏五桂樓、湖州劉氏嘉業堂、余姚朱氏四明樓、嘉興莊氏蘭味軒以及海寧管大雄、諸暨余重耀、杭州徐行恭、陳伯衡、高時顯、馬一浮、張宗祥等著名藏書故家的捐贈。這些藏書家們「可無衣，可無食，不可無書」，他們根據各自的特點，在長期收藏書籍的過程中，保存了大量各具特色的歷史文獻。特別是近現代的一部分藏書家，將多年蒐集、整理、批校的藏書捐贈給浙江圖書館，成為浙江圖書館歷史文獻迅速增長的重要來源之一，形成了館藏文獻集數十家私家藏書特色之大觀的特點。

如南潯嘉業藏書樓主人劉承幹，趁辛亥革命前後社會大變動大批古籍湧向社會之際，收購了甬東盧氏抱經樓、獨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結一廬、豐順丁氏持靜齋、太倉繆氏東倉書屋等數十家藏書。他自稱歷時二十年，費銀三十萬圓，得書六十萬卷。他除藏有大量宋、元、明珍貴古籍外，還大量收藏地方郡縣志，成為其藏書特色之一。一九五一年劉氏把嘉業堂十一萬多冊圖書包括大量方志捐贈浙江圖書館，「文革」期間浙江大學把抗戰勝利後購自嘉業堂的二萬二千餘冊圖書也送給浙江圖書館，堪稱書林佳事。寒柯堂主人余紹宋蓄書二十餘萬卷，尤重視收羅兩浙地方志書，多至數千種，一九五〇年其子翼把所存藏書全部捐贈浙江圖書館。此外，壽松堂孫氏後裔孫峻與復旦大學教授張風的收書特點是收集鄉邦文獻特多，周慶雲收藏書畫金石頗多，余重耀專收碑拓與佛學類書，章嶽收集歷史、地學著作甚

衆，陶承杏對鄉邦文獻、地方志及各姓宗譜收集更勤，高時顯喜收海內罕見本和稿抄本，爲治學實用而藏書的朱駿聲、朱孔彰、朱師轍三代藏書，多爲文字小學音韻、史部正雜野史以及詩文詞章酬唱集，這些藏書家的收藏，後來也以各種方式漸次歸入浙江圖書館。由於這些各具特色的私家藏書的充實，現在浙江圖書館已有善本書近萬種十五萬冊（包括未入目者），其中收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者二千八百八十一種，收入《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者七千五百零六種，另有文瀾閣《四庫全書》三萬六千二百七十八冊。

浙江圖書館收藏的歷史文獻，大致具有以下十個方面的特色。

一、文瀾閣《四庫全書》是鎮館之寶

文瀾閣《四庫全書》是「南三閣」中僅存的碩果，也是浙江圖書館的鎮館之寶。是閣在太平軍兩度攻陷杭城時屢遭兵火與盜劫，建築嚴重毀損，閣書散失殆盡。當時杭州藏書家丁丙、丁申兄弟冒戰亂之險奔走搶救，收集閣書八千三百八十九冊，約爲原書的四分之一。光緒八年(1882)起，丁氏設局補抄閣藏四庫缺書，其所依據底本，除家藏八千卷樓珍本外，復從范氏天一閣、盧氏抱經樓、汪氏振綺堂、孫氏壽松堂等江南藏書名家處尋覓善本，擇優而從，前後七年抄配八百九十一種，補抄二千一百七十四種，合計三千零六十五種。一九一一年文瀾閣《四庫全書》歸併浙江圖書館後，又經錢恂於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三年補抄（稱爲「乙卯本」）和張宗祥於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補抄（稱爲「癸亥本」）之後，已大體復舊，與原書總數相比較，僅缺卷二十九種，不過總冊數已有三萬六千二百七十八冊，超過了原頒冊數三萬五千九百九十冊。而之所以多出二百八十八冊，除了補抄後重訂分合不同造成卷冊差異之外，主要原因是原書所據者或爲殘本，或經四庫館臣刪節，補抄時依據了不少著名藏家的足本作爲底本，故卷冊數比《四庫全書》原本增多了。補抄的文瀾閣本《四庫全書》面目雖非其舊，紙張、裝幀、鈔工也多不及原帙，然而就文獻資料價值而言，多數書勝於原書，其主要體現在丁抄部分。如《竹岩集》十二卷原四庫本僅存三卷。又如四庫所收一百一十八種「春秋」類書，半數以上遭刪改，多者一書達百數十處，甚者整句整頁刪除，以至面目全非，而丁氏補抄本則無此憾。由此可見，浙江圖書館藏《四庫全書》在保存文獻資料上，與其他閣本相比，有其獨至之長。

二、早期寫本刻本頗多精品

浙江圖書館館藏年代最早的藏品，有敦煌寫經十三件二十種，均為唐或唐以前寫本，件數不多，因有名人題跋，甚為珍貴。如北朝寫本《增壹阿含經》卷末有余紹宋題跋，唐人寫經《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卷末有弘一法師李叔同題識，《佛說如來相好經》卷末有馬敘倫、邵裴子題跋，傳世寫本中難得一見。

國內收藏宋、金、元版本最多者首推北京圖書館，次為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收藏宋元刻本四十九種五十九部，其中宋刻本十九種，相比之下，藏數雖少，但宋代刻書盛地的浙刻本、蜀刻本、建刻本均齊，且書品精良。如《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一百零七卷，南宋紹熙間刻印，原係清杭州藏書家壽松堂主人孫仰曾進呈的四庫底本，序頁鈐有「翰林院」滿漢文印，俞樾題識，一九三三年浙江省立圖書館以三千銀圓購得。元本《分類補注李太白詩》、《箋注陶淵明集》及《潛室陳先生木鐘集》為建安吳氏友于堂刊本，國內僅存完本，可謂珍貴。

三、明刻本與明朝史料蔚為大觀

明代刻本與明朝史料蔚為大觀，堪稱浙江圖書館館藏的一大特色。館藏明刻本二千四百餘種三千餘部，其量約占入載《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古籍的一半，其中洪武至弘治年間刻本有八十餘部。在這些明刻本和明史料中，有相當數量的罕見本，收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孤本有二百三十餘種，如錢士升《周易揆》、馬權奇《尺木堂學易誌》、魏時《歷國史補》、沈鯉《綸緋奏稿》、邵陸《兩台奏議》、劉麟長《浙學傳宗》、毛承斗《東江疏揭塘報節抄》、柳是《河東君尺牘》附《戊寅草》及《湖上草》等。值得一提的是《明文類體》（又名《今文類體》），為明人編輯的一種明文總集，原藏四明黃氏五桂樓，全書一百三十八冊，用明嘉靖至崇禎年間刻本直接剪裁輯成。是書收書八十五種，其中孤本二十八種，禁毀書近三十種。此書多收錄明中後期著作，為避文字獄，不署編纂者，托題《今文類體》，直至清末黃氏後人黃安瀾重編《五桂樓書目》時才復正名。《明文類體》雖為類選，卻是整卷整書收錄，保存了大量珍貴的文獻資料。

此外還有一部分未刊稿本抄本，為數也不少。如清初張遺手輯曾祖、祖、父三世遺著《張氏一家言》稿本，此書保存了明代很有價值的史料，清列入全毀書目。《明文海》是一部保存明代文獻的宏編巨著，未曾刊刻，全國收藏較為完整抄本的

僅北京、上海以及浙江圖書館三家，浙本源出手稿本，基本沒被刪改過，比別本多一千一百餘篇，而一九八七年中華書局影印本只補輯了一百五十九篇。

由於有以南明史著作爲收藏重點的傅以禮長恩閣藏書的充實，浙江圖書館的明末清初史料的收藏在國內獨占鰲頭。如《魯之春秋》專記南明魯王監國政權在浙東及浙閩沿海抗清事蹟，《南渡錄》傅以禮校本記述「南明弘光一代時事最爲詳允」，《嶺表紀年》傅以禮校本記明末永曆小朝廷事，《狩緬紀事》、《明末滇南紀略》、《安龍逸史》、《皇明末造錄》記載南明永曆小朝廷後期入緬、在緬和出緬而終至覆亡的情況，《流寇志》敘述明末農民戰爭，等等。

此外，館藏尤多明刊醫書，收入《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者計一百九十二種，其中二十九種屬全國孤本，馳名中外的「青春寶」一方，即出自館藏明刻本《奇效良方》一書。尚有陰陽五行與命相之書頗豐。

我國古籍套印本中數明代閔齊伋、凌蒙初兩家刊印者最著名，因兩家均出在浙江湖州，故浙江圖書館收藏閔、凌兩家套印本最富，充分反映了當時套版印刷業的盛況。

四、明清以來詩文詞章網羅甚富

明清學者詩詞文集亦是浙江圖書館館藏的一個重要部分，總數達六千多部，其中文別集二千多部，詩別集三千多部，詞別集約六百部。在這些集子中，孤本、名人稿本、名人批校本更爲珍貴。館藏明別集孤本約七十種，清別集稿本約二百六十餘種，其中有明黃淳耀《陶庵集》、杜方《南禺外史詩卷》、王思任《王氏書稿》等。明來集之的手稿，除已刻印者外，幾乎全存浙江圖書館，明祁彪佳遠山堂諸稿也爲數不少。還有清袁枚《隨園詩稿》、姚鼐《姚姬傳詩》、阮元《文選樓詩草》等。較爲難得的是集子中經名家批校的書甚多，其中有鄧以讚、何焯、杭世駿、盧文弨、齊召南、王念孫、王引之、李兆洛、朱駿聲、莫友芝、孫衣言、李慈銘、蔣光燾、傅以禮、翁同龢、沈增植等人的批校，也有萬泰、毛奇齡、吳錫麒、孫繼涵、王宗炎、周廣業、姚燮、俞樾、康有爲、王國維、章炳麟等人的題識。這些批校者與題跋者，或是版本目錄學家，或是古籍收藏家，或是著名學者，經過他們加工，書籍的史料價值也就大大提高了。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圖書館還藏有爲數不少的近現代學者的著作和遺稿，如陳漢章、邵端彭、朱祖謀、朱孝臧、吳士鑑、余紹宋、平步青、經亨頤、王繼香、陶澐

宣、余重耀、王修、金梁、馬一浮、張宗祥、朱師轍等人的著述，由於這些學者所處年代正值清皇朝覆滅，舊學沉淪，新學漸興，彼時文化學術領域的研究多具承前啓後繼往開來的意義，由於外患內亂，不少學者的研究著作還沒來得及披露而入藏圖書館，浙江圖書館館藏此類學者文獻約四百種二千一百餘冊。陳正宏先生與筆者合撰的〈新發現唐質手書陳寅恪先生詩〉一文，公佈了一部分陳寅恪佚詩，就是從朱師轍詩稿中發現的。

五、地方文獻積聚已成系列

地方文獻在館藏中一直占十分重要的地位。歷經百年的辛勤蒐訪與積累，浙江圖書館收藏的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地方文獻已基本形成較為完備的系列，其內容包括鄉賢遺著、地方志、年譜、族譜、文史資料、報紙期刊等，專門編有《浙江圖書館地方文獻資料目錄》，收錄一萬一千六百十五種。

浙江先哲遺著是地方文獻重要內容之一。據毛春翔先生統計，《四庫全書總目》正編著錄的浙江籍人著作有七百九十六種一萬六千零三十七卷，存目著錄的有一千五百零五種二萬九千零六十一卷，合計著錄種數占全書四分之一弱，卷數占五分之一強。由此可見乾隆以前浙江先賢在中國古文獻史上成就之輝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收錄浙江圖書館館藏善本二千八百八十一種，而《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收錄七千五百零六種，幾乎翻了一倍半。增加著錄的善本書大部分為鄉邦文獻，包括鄉賢稿本遺著。以清別集為例，《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共著錄六百四十一種，內含浙籍著者稿本二百六十三種，占五分之二強，可謂集浙江鄉賢遺著薈萃一堂。其中較著名者有諸暨陳洪綬稿本《筮儀像解》、紹興張岱稿本《四書遇》、錢塘陳群稿本《進呈詩副本》、錢塘吳農祥稿本《梧園集》、山陰沈復燾稿本《別號錄》、海寧查慎行稿本《壬申遊記》、蕭山汪輝祖稿本《龍莊先生詩稿》、鎮海姚燮稿本《詩問》、《今樂府選》和《蛟川耆舊傳》、管庭芬稿本《日譜》等。此外，清代浙人所輯地方藝文總集，浙江圖書館亦收藏頗多，像吳顯、吳振棫《國朝杭郡詩輯》、陶澐宣《國朝紹興詩錄》等也都是重要的鄉賢遺著。

地方志是地方文獻中十分珍貴的一部分資料。文化之邦浙江素來就有修志傳統，經過幾十代人的不懈努力，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地方志，成爲一筆巨大財富。浙江圖書館收藏地方志有六千七百八十一種、四萬九千五百六十一冊，覆蓋各省，尤多浙江。收集浙江地方志六百多種，雖不能說歷代所修的本省方志皆有，但品種幾

乎覆蓋全省各府、縣、鄉、鎮，其中不乏珍貴之本，如《（弘治）蘭溪縣志》、《（萬曆）義烏縣志》、《（萬曆）蘭溪縣志》、《（萬曆）龍遊縣志》、《杭城坊巷志》等。另有一些專志，如稿本《武林坊巷志》，也極具文獻價值。為此館內編有《浙江圖書館館藏方志目錄》與《浙江圖書館館藏浙江省地方志目錄》，全面反映了這方面的館藏情況。

清末及民國時期在浙江出版或由浙人編刊的期刊與報紙也為館藏重點之一。這方面的收藏雖然在抗戰淪陷期間損毀慘重，但一九四九年前浙江省境內出版的中文報紙仍有二百二十七種，編刊的期刊達一千二百三十三種，且不乏珍品。如一八七八年七月創刊的《小孩月報》為我國最早畫報，一八九七年創刊的《經世報》為杭州第一份新聞報紙，此外還有《杭州白話報》（1901年起）、日本東京浙江同鄉會編的《浙江潮》（1903年起）、《越鐸日報》（1912年起）、清末出版的各期《浙江官報》等。八十年代後，以縮微膠片形式進行了大量補配，諸多重要的地方報刊如《東南日報》、《新浙江》、《西湖博覽會會刊》等得以配齊，不失其特有的魅力。編有《浙江圖書館館藏一九四九年前創刊報刊目錄》。

文史資料藏量豐富。浙江圖書館在創辦初期就注重對家譜、族譜、學校講義、機關刊物、名人信底稿簿、照片等的徵集和收購，加上「文革」期間浙江文史館收藏資料的贈送，浙江圖書館現藏有二千多種（件）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這類特殊的地方文獻資料。其中浙江各地區的專題調查報告和某些官僚人物的資料較為豐富，如一九六五年從杭州古舊書店收得了一批高英後人出售給書店的資料。高英在光緒二十五年（1899）四月至十月署台州知府，是經辦海門教案的主要官吏之一，因此這批資料除含有關高英本人仕宦經歷的資料外，其中還有相當數量為涉及海門教案的卷宗文稿。另外收有岑毓英、傅雲龍等人的大批資料，是研究近代浙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重要歷史材料。

六、釋家經典不乏珍寶

浙江圖書館館藏的釋家經典也不能忽視，除唐人寫經和元刊本《普寧藏》殘本外，還收藏著相當豐富的明清零本佛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永樂八年（1410）至正統五年（1440）刻、萬曆年間增刻的《北藏》，館藏六千三百三十四冊，其刻印精湛，至今書品如新，裝潢的封面、封底、函套是用幾百種不同色彩、不同網底圖案織錦製作，圖案千姿百態，令人叫絕。此外還有明萬曆年間刻的《徑山藏》及清康

熙年間續刻的續藏，清代的《龍藏》，以及日本的《大藏》等。編纂《中國古籍目錄》時，分工浙江圖書館負責釋家類目錄編制。隨著佛學研究的深入，這部分經典當可發揮其應有的效用。

七、域外漢文古籍收藏別具特色

古代的日本、朝鮮和越南模仿中國刻印典籍的習慣與形式，刻印了大量的漢文典籍。日本的稱和刻本，朝鮮的稱高麗本，越南的稱安南本。由於地域阻隔等方面的原由，這些本子中的那些翻刻古代中國文獻的本子，成了我國古籍在域外傳播與保存的一個特殊系統。以往它們不太受重視，隨著國際間漢學文化交流的深入發展，人們逐漸認識到其中蘊藏著的豐富史料的價值。如初唐重要政書《群書治要》五十卷，北宋初尚有著錄，元初已佚，日本元和二年(1616)德川家康據金澤文庫舊藏古寫本以銅活字印行，浙江圖書館收藏有此書。此外館內還收有一部分日本人或朝鮮人撰寫的漢學著作。浙江圖書館館藏域外漢學古籍最多者數日本人撰或刻的本子，總數達四百餘部，朝鮮人撰或刻的本子次之，也有二百二十多部，另有越南刻本四部。其中較為珍貴者有日本慶長十九年(1614)刻本《魁本大字諸儒箋解古文眞寶後集》，日本寬永十七年(1640)刻本《禪林類聚》、日本正保二年(1645)刻本《丹臺玉案》、朝鮮世宗十年(1428)銅活字本《文選》、朝鮮光海君七年(1615)刻本《治隱先生言行拾遺》、朝鮮世祖二年(1456)銅活字本《瘡疹集本朝經驗方》等。已編館藏日本、朝鮮、越南漢學古籍目錄。

八、名人手札兼具史料與藝術價值

浙江圖書館收藏有古、近代名人手札約二萬件，時間橫跨明、清和民國，最早者有毛奇齡書信一通。這些信札不少出自名人之手，如李鴻章、翁同龢、趙之謙、林則徐、左宗棠、張之洞、黃遵憲、汪康年、俞樾、阮元、馬一浮、李叔同、黃賓虹等。這些書信的內容廣泛，有軍事戰況、人事變遷、時政得失、學術商榷、商業經營、郡邑逸聞等，內存大量歷史資料。有些雖是短箋零簡，卻留下昔人的筆墨奇姿與書法風格，有很高的藝術和文物價值。館藏各類人物的信札已於一九八八年整理完畢，設有書本和卡片兩套目錄。二〇〇〇年百年館慶，精選出一百三十人計一百九十四通信件，影印出版，以饗讀者。

九、金石拓片數量豐富品質多佳

金石拓片亦可稱數量豐富品質多佳的一類館藏歷史文獻。金石文字是史學的實物憑證之一，向為古代學者所重視。自宋歐陽修《集古錄》至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皆為探求和記載天下所存碑碣而輯成的巨編。浙江的金石文字歷史久遠，秦有始皇下會稽勒石，漢有《三老碑》，晉有《蘭亭碑》，北宋有《表忠觀碑》，南宋有石經，名揚中外。浙江圖書館歷來重視蒐集歷代金石拓片，一九一六年曾提議浙江省省長公署發布通令，要求各縣拓送碑碣石刻，此後即有三十二個縣陸續送交了大量的拓片，品種包括墓誌、墓碑、碑記、摩崖、造像、法帖等。現在館藏金石拓片約有三萬餘件，金文拓片以原澉秋館舊藏的金器拓本為最精，碑文拓片以黃河流域古碑為最多。有名的拓片有漢《三老諱字忌日記》、漢《大吉買山地記》、唐《阿育王寺常住田碑》、宋《表忠觀碑》等，計有六百餘種拓片入了館藏優本目錄。三萬餘件拓片中，來自浙江者占二成，一九八二年編了《浙江圖書館館藏浙江金石拓片目錄初編》，《浙江圖書館館藏金石拓片目錄初編》正在編制中。

十、皮藏木刻板片堪稱一絕

建於清同治年間的浙江官書局在宣統元年(1909)併入浙江圖書館後，用於印書的木刻板片也就成為浙江圖書館館藏內容的一部分。以後杭州汪氏振綺堂、永康胡宗懋退補齋、杭州丁丙八千卷樓以及南潯嘉業堂等又陸續捐贈了一大批，收藏量最多時達二十萬餘塊，絕大多數是官書局成立後刊刻的，少數為官書局收藏過去刊刻的，最早為乾隆年間復刻明永懷堂版《十三經古注》。版片除小部分已霉爛清理剔除外，現藏有完整的木刻書版二、三、九種，其中單行版二、一、五種，叢書版二十四種，共約十五萬塊。全部皮藏南潯嘉業藏書樓書庫。《九通》、《四明叢書》、《金華叢書》、《續金華叢書》、《嘉業堂叢書》、《嘉業堂金石叢書》、《留餘草堂叢書》等書的木刻板片都保存完好，成為我國圖書館界的一大奇觀。為有效地保護書版，並充分發揮其文獻效益，浙江圖書館先後與數家出版單位建立了協作整理修補古籍書版及印刷書籍的關係。一九六四年杭州市圖書館與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聯合借用《資治通鑑續編》、《適園叢書》、《四明叢書》等十一種書版，運至揚州重印。